

滄海叢刊

郭恒鈺 著

俄共 中國革命

祕檔

(一九二〇~一九二五)

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
斷無成就

孫文



東大圖書公司

滄海叢刊

郭恒鈺 著

俄共 中國革命 祕檔

(一九二〇~一九二五)



東大圖書公司

俄共中國革命祕檔（一九二〇——一九二五）／郭恒鈺著.--初版.--臺北市
：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民85
面； 公分（滄海叢刊）
ISBN 957-19-1875-X（精裝）
ISBN 957-19-1876-8（平裝）

1. 中國-外交關係-俄國

644.8

84011992

◎ 俄 共 中 國 革 命 祕 檔
（一九二〇——一九二五）

著作人 郭恒鈺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郵 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

編 號 E 62039

基本定價 貳元捌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9-1876-8（平裝）

前記：關於俄共的中國革命祕檔

二十年代的國共兩黨關係，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段具有重大意義和影響深遠的歷史。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清黨」。七月，「中國大革命」慘遭失敗。三十年代，國民黨「圍剿」「共匪」，中共死裏逃生。四十年代，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播遷」台灣。今天，海峽兩岸，一邊高喊「一國兩制」，統一中國；一邊強調「政治實體」，建設「大中原」。如果秋後算帳，溯本追源，所有這些都與蘇俄有密切關係。

二十年代的國共兩黨關係史，是一筆糊塗老帳。大陸與台灣雙方所發表的檔案與專著，對於探討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如「孫越聯合宣言」的幕後交涉、孫中山的「西北計畫」、蔣介石及胡漢民訪問蘇俄等，並無多大補益。但是，所有這些又都與蘇俄有密切關係。

蘇聯解體後，一九九二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前蘇共中央檔案館（現已改稱：「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存及研究中心」）及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研究）共同合作，進行整

理、發表俄共(布) ①與中國革命有關的未刊祕密檔案。俄文版與德文版同時發行，內容相同

②。二十年代的《俄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共有兩卷：第一卷(一九二〇～一九二五)，第二卷(一九二六～一九二七)。這兩卷收入的文件，是以蘇俄在華推行民族革命運動過程中俄共與國共兩黨關係為主。其中包括：俄共中央政治局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其駐華代表及中共發出的指示文件、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顧問自中國寄至莫斯科有關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政治軍事情勢發展的報告及電報以及他們與國共兩黨人物的來往函件、一九二三年蔣介石及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胡漢民訪問蘇俄的文件等。

選入的文件是：(一)以迄今尚未發表的祕密檔案為主。(二)對某些歷史懸案提供新的史料，對某些理所當然的推論或誤解，推出新的證據。(三)有助於透視蘇俄對華政策的形成、背景以及如何在中國具體推展民族革命運動。

在第一、二卷選入的文件中，最重要的祕檔是俄共(布)及蘇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

①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俄共(布)改稱爲：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蘇共(布)。

② 《俄共(布)、共產國際及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第一卷(一九二〇～一九二五)俄文版已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出版。德文版即將付印。「俄共中國革命祕檔」研究計畫主持人，俄方是：基達連克教授；德方是：郭恒鈺教授。

其所屬的「中國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這些記錄證明，「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這一「命題」是錯誤的，共產國際不過是一個執行決議、傳達指示的對外機構而已。因為一切有關革命運動的政策略線、具體指示、軍事援助、共黨經費、人事任命等，都要在政治局進行討論，做成決議後，交付執行。俄共中央政治局才是「世界革命的指揮總部」。

第一、二卷選入的大多數文件，是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及其他蘇俄駐華人員向莫斯科發出的報告、電報乃至私函。這些文件對於瞭解在執行莫斯科路線、指示時，共產國際內部及其駐華代表之間所發生的爭論與矛盾、成果與後果，具有高度史料價值。

理論上，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是由遠在莫斯科的俄共發號施令，統一指揮。但事實上，特別是在情勢急遽變化的時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及中共一方面要忠實地執行莫斯科的指示、決議，另一方面又要對急轉直下的緊急情況採取相應措施。這些文件具體地反映了僵化教條與實際情況之間的矛盾和莫斯科的相應態度。

俄共布爾什維克的對外政策，內政亦然，是從實現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出發。其手段是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解放運動來消滅或分化「帝國主義的後方」。因此，在世界革命的理論及實踐上，「東方」就佔有重要的地位。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月）有關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各項決議以及列寧提出的反帝統一戰線

的構想，即其明例。在這個基礎上，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月）的「東方問題總提綱」提出了解決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

共產國際雖然承認「東方」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但對東方所知有限，對在東方推行民族革命、解放運動，既無理論可循，亦無實際經驗可供參攷，更談不上具體方案。共產國際二大與四大大的決議，不切實際，空洞矛盾。因此，在推行民族解放運動方面，只有藉助於俄國的革命經驗，深信「放之四海而皆準」。在中國開展的工農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

俄共祕檔一再證明，莫斯科在空想與現實之間，讓僵化的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走，一步一步地走向失敗之路。「中國大革命」失敗之後，當時俄共之間以及共產國際與中共之間，還有中共自己直到今天還在爭論錯誤誰犯與誰負責任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著者

一九九五年三月於柏林

目次

1 次 目

前記：關於俄共的中國革命祕檔	
蘇俄與國共兩黨關係（一九二〇—一九二五）	一
第一章 建立共產組織	五
第二章 尋找革命盟友	一三
第三章 莫斯科：孫吳合作	一九
第四章 孫中山的「西北計畫」	二七
第五章 莫斯科：棄吳聯孫	三七
第六章 孫越聯合宣言	四三
第七章 維廷斯基與「五月指示」	五一
第八章 蔣介石訪問蘇俄	五九

第九章	共產國際與新三民主義	七一
第十章	鮑羅庭與國民黨改組	八五
第十一章	「右派」：「好好的分家」	一〇五
第十二章	孫中山繞道日本北上	一二五
第十三章	援馮討奉、鞏固廣東	一三七
第十四章	莫斯科：路線不變	一五九
人名索引		

蘇俄與國共兩黨關係（一九二〇—一九二五）

根據一九二〇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共產國際要：一、在中國推行「民族革命運動」，因為它是反帝的（中國軍閥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民族革命運動是一個多階級的，民主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要建立一個聯合各種革命勢力的統一戰線。三、這個統一戰線要由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來領導，所以國民黨必須改組成爲一個具有戰鬥力的「工農政黨」，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四、中共要「參加」這個民族革命運動和統一戰線，因爲中國的無產階級還不成氣候，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另外也要監督國民黨不要與帝國主義妥協，而脫離革命路線。由於共產國際對於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定位及決定中共所應扮演「參加」而非「節目主持人」的角色，因此也就沒有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更談不上中共要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在中共黨史中對共產國際在這兩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的指責，也就毫無意義。以上四點，可以稱之爲「列寧遺教」。自一九

二一年～一九二七年武漢分共，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基本上信守不渝。

自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民族革命運動的策略是：促使孫中山與吳佩孚合作，成立一個親俄的聯合政府，反帝、反對張作霖。孫中山拒絕聯吳棄張，要求蘇俄支持他的「西北計畫」，即在西北邊境的新疆或外蒙用俄援建立革命基地、革命武裝；從西北進攻，打倒北京軍閥政權。因為孫中山認為以廣東為革命基地，過去的經驗證明是極端不利的；不僅受制於英國，又要對付各路軍閥，腹背受敵，力不從心。在西北邊境，背後是盟友蘇俄，遠離帝國主義勢力，可以放手準備「北伐」。日本可能蠢動，但是孫中山相信他有「十萬大軍」，再加上張作霖，可以應付。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孫越聯合宣言，是蘇俄聯孫的開始，並接受了孫中山兩百萬金盧布經援的要求，但對孫中山的西北計畫沒有明確表態。一九二三年七月，孫中山派蔣介石組團訪俄，其主要任務就是在莫斯科與蘇共領導人物磋商如何實現西北計畫。俄方拒絕，因為外交上蘇俄避免可以引起日本干涉的任何軍事計畫；在內政上，首先這個五花八門，無所不包的國民黨必須改組成一個具有戰鬥力的「農政黨」。其次國民黨要建立革命武裝力量。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斯基說：「要在中國完成某種程度的政治、軍事準備工作之後才能討論。」

蔣介石在莫斯科參加了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共產國際主席團與孫逸仙代表團聯席會議」，也

參與討論十一月二十八日通過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對共產國際來說，這個決議是蘇俄在意識形態上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的基本綱領；它主要表現在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上。國民黨一大宣言中的「國民黨主義」，就是以此一決議為藍本，也是中共今天所說的「三大政策」的歷史根源。

孫中山當時聯俄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西北計畫，蘇俄的經援與軍援是主要因素，也有地緣政治的考慮。但是，當俄方拒絕他的西北計畫之後，孫中山同意接受俄方建議，全力從事政治工作，也就是改組國民黨，使它成爲一個具有戰鬥力的革命政黨，建立革命武裝力量。用孫中山的話來說，就是「以俄爲師」。但是，孫中山並未因而放棄以廣東爲革命基地進行北伐的計畫，建立以孫中山爲首的北京政權，用他的「實業計畫」建設中國。

根據列寧遺教，共產國際要在中國推行反帝、反軍閥的民族革命運動。因爲這個民族革命運動是一個多階級的，民主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要建立一個聯合各種革命勢力的統一戰線，並且由國民黨這個資產階級政黨來領導。共產國際全力支持孫中山的目的是，用一個具有戰鬥力的「工農政黨」——國民黨和在蘇俄顧問援助下的革命武力，打倒北京軍閥，建立一個以孫中山爲首的親俄政權，一方面進行反帝鬥爭，一方面使農民運動進入土地革命階段，掃清封建經濟制度，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

共產國際與孫中山在打倒北方軍閥、建立國民黨的北京政權的立場上是一致的，祇是雙方的出發點與目的不同，所以在一九二四年至孫中山逝世的這段時期的孫俄關係，堪稱合作無間。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民族革命運動，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無中生有，搞出來一個中國共產黨，一是起死回生，以蘇共為藍本改組了國民黨。國共兩黨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都進行了你死我活的殊死鬥爭。今天，海峽兩岸一邊高喊「一國兩制」，一邊要求承認為政治實體。溯本追源，共產國際是始作俑者。

——（本文原刊於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
「解析孫中山先生的聯俄政策」）

第一章 建立共產組織

中共黨史學者，對於中共建黨問題，頗為重視。專著論文，為數可觀。傳統的說法是：李大釗與陳獨秀最早提出建黨思想，是黨的主要創始人。官修黨史說：「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同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進行聯繫後，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①換言之，共產國際在中共建黨過程中，祇是發生了「幫助」的促進作用。廖蓋隆說：「共產國際的幫助誠然是促使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就得以成立的重要條件，……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共產國際幫助的話，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會稍許推

①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北京，一九九一，頁五六。

遲一些的。」^②

官方說法是以論代史，難以採信。向青教授持有異見^③，但屬「非主流派」。

根據俄共祕檔，我們得知：俄共是中共建黨的「節目主持人」；俄共與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代表的任務，就是讓那些醉心社會主義、歌頌十月革命、痛恨帝國主義的知識分子，走出象牙之塔，建立共黨組織，從事有血有肉的革命活動，並在政治上、組織上和經費上給予「幫助」。

一九一八年七月，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之後，如何結束戰事，解決經濟崩潰以及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是首要問題。除了跟德國議和和實行新經濟政策外，主要出路是，根據世界革命的理念，在東方各地進行反帝的民族革命、解放運動。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稱：工人的解放不是一個地區的、民族的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問題；必須協調無產階級的行動，而且民族的利益必須隸屬於「國際革命的利益」，也就是蘇俄的利益。一九二〇年七月至八月，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了「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和組織原則，以及共產國際的理論和策略等基本問題。根據

^② 廖蓋隆《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一書》，見《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統一戰線》，郭恒鈺著，李達六譯，北京，一九八五，頁八—九。

^③ 向青「中國共產黨創建時間的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見：《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二大的有關決議，共產國際決定：

一、在東方各地建立具有執行共產國際政策和路線、宣傳馬列思想以及推行民族革命運動能力的共產組織或共產黨。

二、在東方，共產主義思想，影響有限；無產階級不成氣候，還不是獨立的社會力量。此外，在當時民族革命運動又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格，所以共產國際的決議指出：共產黨人的主要任務是全力支持民族革命運動。

因此，俄共及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民族革命運動，負有兩大任務：

一、建立共黨組織，

二、尋找革命盟友。

先談兩項中的第一點。

蘇俄外交事務人民委員會派駐遠東的全權代表維林斯基·西比亞可夫在他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關於一九一九年九月至一九二〇年八月期間在遠東地區的工作報告中提及，他早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前），就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有關在遠東人民中間

進行共產主義活動的提綱，經政治局批准後，他攜帶具體指示，以外交事務人民委員會派駐遠東的全權代表身份出發^④。俄共中央的指示，有三點應予引述：

一、蘇俄遠東政策的出發點是：在遠東，日本、美國與中國的利益衝突，勢所難免，應全力使之提前發生，但要避免蘇俄與日本之間的衝突。

二、蘇俄與中國、蒙古及韓國人民的關係必須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推展從帝國主義桎梏中解放出來的民族革命運動，並給予全力支持。

三、與中、日、韓的革命團體建立經常性的聯繫，並以出版事業為主要手段^⑤。

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國際遠東祕書處」，統一指揮遠東地區（中、日、韓）的革命工作。中國部的首要任務是：透過學生組織，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建立共產主義小組，並以建黨為目的。報告說：中國部的工作，迄今成果可觀。在北京、上海、天

④ 文件4：維林斯基·西比亞可夫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關東亞人民的工作報告（莫斯科，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俄文版與德文版的文件號數相同。

⑤ 同上。